



北京

王志之 著

集

南征北战集

王志之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六月·贵阳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编了作者写的《南昌起义散记》、《北平参加“左联”》、《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抗日同盟军纪要》、《冯玉祥印象记》、《纪念先师吴承仕烈士》、《泊头镇九师学生的正义斗争》等七篇革命斗争回忆录。

一九二七年七月，作者随叶挺的铁军东征，由武汉到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战斗。由南昌回师广州途中，在汕头三河坝战败被俘。后逃出敌人的集中营，回到北平。

一九三一年，在北平参加“左联”，在党的领导下，创办《北方文艺》，宣传抗日。曾邀请鲁迅先生到北师大讲演。在此期间，还参加了为李大钊烈士送殡的一场斗争；为声援北平艺术学院被开除的学生，到中南海怀仁堂伪大学办示威；在北京大学公开驳斥陶希圣讲的《澶渊之盟》的投降主义谬论，被反动当局逮捕，经营救出狱。

一九三三年六月，受党组织的派遣，以平津文总代表到张家口，参加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之后，参加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的北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亲身经历了抗日同盟军的伟大斗争。

一九三二年秋，在河北省泊头镇第九师范学校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们的正义斗争。

目 录

南昌起义散记.....	(1)
北平参加“左联”.....	(23)
华北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	(46)
抗日同盟军纪要.....	(64)
冯玉祥印象记.....	(138)
纪念先师吴承仕烈士.....	(164)
泊头镇九师学生的正义斗争.....	(182)

南昌起义散记

铁军东征离武汉

一九二七年以后，武汉处在千变万化之中。就连天气，也阴晴不定，风雨无常。

七月中旬的一天，驻在武昌城外的二十四师教导队，在日晒雨淋中，完成了三天的演习，顶着倾盆大雨开了回来。

第二天拂晓，雨后初晴，分外凉爽，号音也显得特别嘹亮。集合号还没有停止，四百多青年战士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潮湿的广场上。这时，残剩在房檐下的夜色正在迅速消失中。

大队长孙树成在各中队报告后，立刻发出洪亮的口令：

“立——正！”队伍静肃地伫立在广场中。

国际歌声冲破了大地的沉寂，东方的天边已泛起了日出前的红光。

师长叶挺亲自来参加朝会，向大家讲话的则是恽代英同志。

灿烂的朝霞照着他那清癯的面庞。他用敏锐的眼光，透

过度数相当高的近视眼镜，爱抚地在队伍里望了几遍。

“同志们！”随着他的喊声，全场一致立正。“我们目前的形势危险得很，可能碰到的困难不晓得有几多！但，革命是任何危险吓不退，任何困难挡不住的！”很清晰的湖北口音，突然停顿一会儿，他用很沉重的低声说：“请稍息！”

“现在，我们革命中心的武汉，真是四面楚歌！”他缓过一口气，继续说：“下游是蒋介石的封锁，上游是杨森的进袭，到处的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都在利用各种机会向革命进攻。同时，英帝国主义也想趁火打劫，把一船船印度兵运到武汉来……”

对形势作了详细分析以后，代英同志严肃指出，在内忧外患交迫下，应该同时作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巩固团结，摧毁一切反动派的进攻；一方面加强革命武装，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必须弄明白：巩固团结，就是要坚持革命，我们决不能用放弃革命来取得团结，决不能用投降来代替团结！为了坚持革命要争取团结，为了坚持革命也不要怕分裂！”他讲到这里，突然停顿下来，一只手取下了眼镜，一只手摸出手巾来揩揩满脸的汗水。

我想近一个月来，在一般同志中纠缠不清的团结与分裂的问题，该在这几句话中迎刃而解了。我左顾右盼一下，大家正张着嘴出神地听着。

代英同志的讲演深入浅出，无论讲多长的时间，没有谁感到过疲乏。可是，他的讲演，却很少超出过两个钟头。

讲演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没有料到，师长今天竟一句话也不向大家说，就陪着代

英同志走了。更想不到的是大队长宣布：今天放假半日，十二点钟归队，随时准备着候令出发。

散队以后，人们都忙着出发前的准备。

武汉三镇到处张贴出“拥护中国国民党”的标语，“革命首都”泛起了一片阴影。在我们教导队里，却没有听到过谁为这种前途担忧。它是最初的革命武装干部培训机关，所有的军官、学员都是党团员，一个个都抱定烈火似的志愿，投身到这伟大的熔炉里来接受锻炼的。大家都很深切地感到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值得自豪的！

几个月的军事训练，大家都养成了习惯：在正式命令没有宣布前，谁也不去作任何揣测，当然更不会有任何顾虑。大家都相信我们的叶挺师长和恽代英同志。不过，我们在感情上，对于这两位首长和导师，一般说来也还有些区别。对于叶挺师长是敬畏，对于代英同志是敬爱；假如叶挺师长好比是严父，则代英同志就犹如慈母。我们就是在他们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就在当天下午，大队长向大家宣布：十一军奉命东征，讨伐叛党卖国的蒋介石。我们教导队随师部出发。

黄昏时，我们从武昌汉阳门码头，由汽划子全部运上了停泊在汉口江面的轮船上。也许是因为天气太闷热，也许是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变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怀念，也许是难以揣测的前途，增加了临别时的依恋，人们都拥挤在船头船尾，三五成群，指手划脚地高谈阔论。有的指着黄鹤楼在说围城时的战斗，有的指着江汉关在谈收回英租界的情景，有的在谈国际工人代表团到武汉来的盛况，有的在唱《国际

歌》、《少年先锋歌》。一会儿，歌声渐渐高昂起来，压下了所有的嘈杂声，从船头到船尾，一齐合唱着：“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渐渐地，从武昌的蛇山和汉阳的龟山泛起了沉沉的夜色，淹没了残剩在天边的夕阳，吞蚀了汉阳兵工厂和震华纱厂林立的烟囱，吞蚀了矗立在江汉关的钟楼，大地完全沉浸在黑暗中。

两岸的灯光开始在黑暗中闪烁，我们的船开动了。

革命洪流汇南昌

到九江，船停泊下来。在这里，看到武汉的《中央日报》刊出了我们的《讨蒋宣言》，还刊出了蒋经国在苏联给他的卖国父亲的公开信，声明断绝父子关系。

我们的军事行动使国民党右派十分恐慌。七月二十日，那个自称左派领袖、实系右派头目的汪精卫，急急忙忙地拉着张发奎窜到庐山，策划召开军事会议，要叶挺、贺龙同志赴会，并强令叶、贺部队向九江以南的德安集结，阴谋解除这两支部队的武装。在这个关键时刻，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从第四军军长张发奎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庐山秘密来到九江附近的星子县叶挺同志驻地，和贺龙、叶挺同志一起就近到鄱阳湖中的一条小划子上，商量对策，决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部队不向德安集中，而直下南昌。

这时，听说武汉政府内的一批国民党要人——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与蒋介石合流了。接着，我们留守在武汉的

队长陈守礼同志乘木船逃了出来，我们才知道“革命首都”在我们离开以后，就急转直下，完全变成鬼域世界了！

“汪精卫实在是人妖！”陈守礼同志满口湖南腔，两眼胀得透红，把白色恐怖下的武汉近况向我们报告，“几天前还听他喊：‘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到右边去！’他妈的，一调头来就翻脸不认人！”

“孙科也不是好东西！”本来坐在一旁沉着脸，一言不发的大队附申朝宗突然一掌打在桌上，把话接过去：“不久以前，他在讲演中还说什么，党员是党的工具，党是革命的工具，他是为了革命来入党的，并不是为了党来革命的！真是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现在看来，那些变色龙当时连颜色都没有定准呢！”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功败垂成，武汉政府的突变，这是谁也感到痛心疾首的！但是，我们除了愤恨，谁也没有因此而丧气。武汉政府虽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战斗历程，但却使帝国主义手忙脚乱，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胆战心惊。只就这一点也足够使我们兴奋和自豪了。我们在这个大变动中，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脸，澄清了革命洪流中的渣滓，获得了宝贵的教训，从实践中检验了我们的队伍！暂时的挫折，只能延缓革命的进程，绝不可能阻挡住时代的激流。在逆流急转下，我们能够稳定脚跟，毫不犹豫地继续斗争，就靠这样的认识。这是代英同志老早就给我们打下思想基础了。

在宁汉两股反革命恶浪交迫下，我们不得不改东征为南下。在离开九江时，盛传我们要回师广州，重建革命根据地。

队伍接到命令开赴南昌，不料走到南浔路中途涂家埠车

站，就听说前面的铁桥中断，不能不停了下来。这时，我们大队部的同志们都把大队附申朝宗同志包围起来，探问南昌的情况。

据说，南昌现在是很空虚的，只有朱培德的一个第九军，及三、六两个军的一部分。朱培德原属滇军系统，他在江西的职务是由武汉政府委任的，但他却倾向蒋介石，持反共态度，在他的部队里也“礼送”了一些共产党员。但是，有些地下党员并未暴露身份，仍然保留下来了。陈守礼同志还悄悄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现任第九军副军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是我们的同志。并且，在他主持下的南昌军官教育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大本营。这个军官教育团，设在南昌进贤门里花园角的讲武堂内，名义上属第三军，但在政治上完全由我们的党中央军委领导，除朱德同志任团长外，党代表、参谋长和主要教官也都是由我们党委派的。军官教育团吸收了滇军中和江西地方上的进步青年一千多人，为党培养了许多干部。所以，教育团是南昌革命活动的中心基地。这时，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正在庐山参加反共会议，其第三军王均部的主力在吉安，第九军金汉鼎部的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因此，南昌城内的敌人武装比较薄弱：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一个警备团、第三军的二十三团和二十四团、第九军的一个团、临时归朱培德指挥的程潜第六军的一个团，加上南昌卫戍司令部和王均住宅的警卫队、省政府卫队和一部分宪兵武装。

当时，我们正在集结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兵力大约有三万人。起义部队的主力，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及教导队

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为基础。

七月二十五日，我们开到了南昌。从城外大桥的桥头上一直到城内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欢迎铁军”的标语。对自己光荣的历史，大家都显现出会心的微笑，整齐的步伐显示出我们的自豪感。我们教导队驻扎在公园背后的新建小学内，驻地的左侧就是朱德同志主持的军官教育团。开到南昌后，教导队的学员，一般都分配到团里。中队长、分队长都当了连长、排长。大队长孙树成和大队附申朝宗分任团长、团附。大队部的人员大部仍留团部担任原有的职务，我的工作还是书记。

七月三十一日，正值星期日的早晨，团长向大家宣布了师部的命令：今天禁止外出，说是我们得到很可靠的消息，反动军队正在阴谋策划要解决我们。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先发制人，所以今天要严密戒备。

“没有事的就多休息、睡觉。”团长很平静地笑着说：“把精神养得足足的，好迎接新的任务。”

“干吧！”原任教导队中队长、现任第二营营长的李鸣珂同志声如洪钟，大叫起来：“再不拚一下，也得把人闷死！”

“真是，”陈守礼同志一口接过去，“这一向，尽是反动派向我们进攻，我们步步退让，说是为了团结，武力都让人家手头；说是要防止过火，就让官僚地主任意屠杀我们的工农群众。这叫么革命？这简直是投降！”大家显然对于将要掀起的变动感到极端的亢奋，满腔的怒火再也压不住了。

从傍晚起，我们轮流到附近巡视，注意敌军的动静。

天色一黑，各街口通衢完全安上了我们的岗哨。我们的

口令、标帜、号音都临时改变了；我们的服装，都一律规定要把袖子、裤腿卷起来；我们的手电、马灯都贴上红十字；我们的红蓝白三色领带都换成了红带。

我把今晚的口令发出后，就出去巡视。那天晚上，漆黑的天空，既没有月亮，也不见星光，阴霾密布，非常闷热。我一个人挂上手枪，拿着手电，走出团部。

黑暗和寂静统治了一切。团部对门的砖墙下及街口上，都有我们的步哨，大家不用叫口令，从电筒上的红十字，彼此都远远地认得出是自己人。等到走拢去，彼此首先引起注意的是胸前的三色带变成了红带，立刻好象看得出彼此的心头都在笑。

“有什么动静没有？”我低声问。

“没有，我们的巡查队刚才过去。”

我绕过团部左侧方，望见军官教育团的大门口和往常一样，冷冷清清地只有两个卫兵站岗。从大门望进去，在电灯光的照耀下，望见那宁静的走廊和阴森的树林，引起我产生一些颇有神秘意味的设想：这个军事机关，既是敌人，又是自己人！我知道，他们的团长朱德，是我们的同志，他现在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在准备起义呢？他的部下能不能都听从他指挥呢？几天来，军官教育团的党代表常常到我们团部来“串门”，他也是个四川老乡，我们也很谈得来。我想：这个敌人的军事机关里的自己人可能不少吧？如果打响了，我们的同志能不能很顺利地举起起义的红旗呢？不知道朱德同志这会在做什么？我一心祝愿他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中，顺利地平安地夺取胜利！

公园里传出了单调的归寝号声。我想：今晚上的壮举，我

们一定有充分的把握！因为：第一，到处的交通线都在我军控制下，敌人完全失掉了联系；第二，我们是主动，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势在必胜！

我兴奋地回到团部，报告了情况后，就很放心地归了寝。

“八一”的枪声

我在熟睡中被叫起来，团部里的情况显得异常紧张：在昏暗的灯光照耀下，人们在大厅上拥挤着，都焦急地期待着新的任务。当时，远远地传来了很剧烈的枪声。人们追着团长问：

“贺龙已经干上了，我们是不是也该提前发动？”

照原定计划，是要在午夜后两点钟起义的，现在二十军方面却在半夜不到就打响了。当时，我们认为二十军是为了抢夺敌军的武器，单独提前打响了。事后才了解到：因为出现了叛徒告密，不得不提前发动。

团长打电话向师部请示以后，叫各个营立即按自己的任务发起攻击。

团长孙树成和二营长李鸣珂率领着第二营，向公园内一个团的敌军后侧展开攻击。

随着紧张的号音、激烈的枪声，团部里所有的灯光霎时熄灭了。团部外面人声鼎沸，还能很清晰地听到李鸣珂同志不断地在大声呼喊：

“冲上去！冲呀！”

整个南昌怒吼起来了。远近的枪声、号声和战士们的叫骂声，把几个月来闷在心头的怨声一起吐出来了。

陈守礼同志率领着教导队留下来的十几个学员同志，守卫着团本部大门。我们隐蔽在大门的石柱旁，注视着外面的战斗情况。在昏暗的月色下，可以隐约望见公园内的敌人在射击，从砖墙上发出很密的闪光。公园后门的广场上，密密的机枪声中，一阵阵的呐喊和叫骂，立刻就接上一阵手榴弹的爆炸声。

一会儿，团长气喘吁吁地跑回团部，给师部叫电话：

“公园里抵抗很顽强，敌人要从后门冲出来，希望快增加两挺机关枪，越快越好！”

团长打过电话，又冲出去了。

这时，我蓦然望见右侧方的街面上涌现出了黑压压的一股敌军，随着一片密密的枪声，直向团部猛扑过来。子弹打在面前的石壁上，钻起片片的砂粒迸在脸上，使我睁不开眼。当时，守卫在团部门口的十几个学员突然往后一退，我也不由自主地往石壁后一躲。

“不准退！”陈守礼同志笔直地横站在大门口，右手插在腰间，左手举起手枪向着外面连放几枪。随着他的喊声，学员们又一齐转过身来，向着冲到门口的敌人射击。

我很为陈守礼同志担心，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抓着他腰间的皮带往门侧一拖：“当心，那面还有一股敌人！”

就在这一刹那，陈守礼同志突然按着肚子坐了下去，我用尽力气把他拖离危险地带，叫两个学员抬进屋去。

正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听着李鸣珂同志在左侧方大声呼喊着，带着我们的队伍冲了过来，把扑向我们的一股

敌人击退了。

“陈队长挂彩了。”学员们在向李鸣珂同志报告。我走进屋去，陈守礼同志一声一声地在叫肚子痛，在幽暗的灯光下，医官陈华正在给他打针。

“你打的什么针？”我问。

“吗啡针。”平常活泼而诙谐的陈华，这时显得异常严肃。他慢慢地抽出针来，附在我的耳边说：“脉搏已经停了，只好给他打一针止痛……”

“不准退！”陈守礼还在不断地叫。

一会儿，团长回来了，说是全城的敌人已经解决，只有公园内的敌人还在负隅顽抗。

当我们的队伍押着大批俘虏陆续开回来的时候，陈守礼同志已经停止了最后的呼吸，同志们垂着头簇拥着烈士的遗体走出了团部。

团部内的两廊下堆满了缴来的追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等武器；陆续押来的俘虏把一个大坝塞满了。

团部的同志立刻忙了起来：点验武器，清点俘虏，造具清册。

俘虏的士兵有诉苦的，有告发他们的长官的，说他们的长官克扣军饷，他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领过一文钱了。

陈华把我拖到一个俘虏的身后，指着告诉我：“你看这个人穿些什么？这样臃肿！”被我们注意到的是一名敌军连长。我们当时就叫他自己的士兵检查，原来他的大腿上及腰间捆满了钞票，在两只胳膊上还查出了一对金圈。

有了这样的发现，团长当时就决定替他在全连的士兵欠

饷发清，剩下的钱和金圈充公了。

在发欠饷时，有的士兵感激得流下泪来，说他们的长官从来没有这样对他们好过，今天当了俘虏倒受到这样的优待！

听着这些感激的话语，我想到：起义的胜利，对于广大的敌军士兵也是一个解放。他们会认识出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会和我们携起手来，一同前进。

起义胜利后，前委在原江西省府西花厅召开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首先由叶挺同志报告了起义经过，接着推举了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有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叶挺、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彭湃、徐特立、何香凝、苏兆徵、郭沫若等二十五人组成，并以宋庆龄、贺龙、恽代英、郭沫若等七人组成主席团。会后，发表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等文件。

南昌起义部队和参军的工农群众、部分俘虏兵在参谋团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整编，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前线委员会决定：贺龙同志为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为参谋长，郭沫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部队总兵力两万余人。

南征途中闻捷报

八月六日，回师广州的长征开始了。

出发的命令严格规定：从师长以下，每个人的行李不得超过二十斤；除了年老有病不能步行的人，一律不准骑马。因为我们没有后方的接济，一切械弹就不能不随部队尽量带走，所有的马匹都用来运大炮和炮弹。在烈日炎炎下，开始了艰苦异常的南征。

过了抚州，我们开始走上了起伏不断的山间小石铺成的盘山路，路越走越窄，队伍变成了单行。后面的队伍只要停下来，就一个个抱着枪靠着山坡睡着了。我在睡梦中，突然一声叫喊把我惊醒：“他妈的！怎么朝人的身上踩？”“你怎么开口骂人？”四川口音引起了我的亲切感，我使劲睁开睡眼一看，原来是郭沫若同志踩着了一个士兵；恽代英同志拉着他说：“走吧，挨句骂，么要紧。”我很注意那个鲁莽的士兵，只见他依旧抱着枪倒了下去，又睡着了。好象才一眨眼工夫，队伍又开动了。

“跟上去，不要站住了！”

我只感到自己身上的负担越来越重，好不容易爬上了山顶，看见一片阴凉的树荫下，人们都躺在那里休息。我拖着沉重的两腿拐到了那里，斜靠着树根坐下，阵阵凉风拂面，一闭眼就睡着了。好象刚合上眼，就有人把我拖了起来：“走！快走！后面没有人了！”

睁眼一看，原来是医官陈华同志。果然，四周静悄悄